

沟口雄三著作集

沟口雄三

著

李卓吾·两种阳明学

孙军悦 李晓东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B248. 25

33

沟口雄三著作集 孙歌 主编

孙军悦 李晓东 译

沟口雄三 著
李卓吾·两种阳明学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卓吾·两种阳明学 / (日) 沟口雄三著；孙军悦，
李晓东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4
(沟口雄三著作集)

ISBN 978-7-108-04733-5

I. ①李… ②沟… ③孙… ④李… III. ①王守仁
(1472-1528) 哲学思想—对比研究—中国、日本
IV. ①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9542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网 址 www.sdxjpc.com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4月北京第1版

201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8.625

字 数 172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38.00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沟口雄三著作集



文革期间，时任日本埼玉大学教养学部助教授的
沟口雄三，与同事、学生在一起。



《李卓吾：一个正統的异端》日文版
(集英社，1985)

代译序 追寻形而下之理

孙 歌

继 2011 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沟口雄三著作集前四本之后，经过译者们的共同努力，后四本的翻译也终于面世，沟口先生一生著述的主要代表性文字得以相对完整地呈现给中国读者。这个翻译的过程，对于我个人而言，也是一个深入的自我训练过程。在沟口先生的思想世界中谨慎地前行，使我获得了中国历史世界多姿多彩的、有生命力的思想投影；当这些鲜活流动的投影在沟口先生感性而思辨的论述中逐渐形成一个动态结构的时候，我真实地体会到了在历史中寻找原理、探寻历史动力这项思想工作的魅力。

在沟口有关哲学概念的论述中，最为独特的或许是《中国的心》。这篇论文与他的阳明学研究直接相关，而且从开篇就引入关于“诚”的讨论来看，这种谋篇布局的方式显然是以对于中日阳明学之间差异的辨析为重点的。在他一系列关于“两种阳明学”的讨论中，这篇《中国的心》都提供了思考路径，因此，这篇论文似乎应该与他关于阳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理解。

沟口认为，“心”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定位，绝不能等同于欧洲哲学史上唯心论中“精神”或者“心灵”所占的位置，即它不能仅仅被视为独立于物体的精神；中国哲学面对的中心课题，并非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而是自我的内部如何呈现理法的问题。

沟口指出，在中国哲学史中，“心”虽然在六朝和唐代由于佛教的缘故得到了宇宙论式的发展，但是在宋代以后，朱子学统合儒释道三家形成体系之后，它就退到了佛教领域之内，它的泛宇宙性并没有构成与理学相对的另一个体系，反之，它在后来的思想史中被天理和理气的系统所吸纳和改造，成为一个旁支。这样的“心”，沟口为它规定了三个基本特征：1，环宇宙性的特点；2，虚灵、活泼性；3，带有本体论性质。就第一个特征而言，心的环宇宙性并不仅仅在于它不受到客观物质世界的限制、可以浮想联翩遨游宇宙，而是在于它是一种与宇宙万物交流的功能，是天地之生意的发用状态。通过心的这种环宇宙功能，人与万物之间才具有了建立“一体之仁”的基础，这恐怕同时也构成了沟口研究阳明学时所强调的阳明心学与乡村变革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吧。就第二个特征而言，心的虚灵与活泼是体与用的关系，沟口进一步把它转化为心与气的关系，并通过对宋代以后思想史中相关论述的解读指出：虚灵与活泼这一心的特性，并非是个人的禀赋，而是只有依靠与“天地之气”的流通才能产生，且具有气中之理的特征。关于第三个特征，即心的本体论性质，指的是以某种形式呈现的与宇宙的理法合一的

心，所谓本体，绝非某种固定不变的实体，它只不过是内在于各个事物的、被分有的法则而已。日本的心的概念，正是由于在上述这第三个特质上与中国的心不同，即日本的心并不关涉作为法则的事物之“条理”，本体论特征比较淡薄，所以，它的环宇宙性与虚灵、活泼性就向着迥异于中国的方向展开。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日本的阳明学理解之中。

阳明学对日本人而言比朱子学更容易感到亲近，这当然首先因为“心即理”的命题为日本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切肤的想象空间。沟口认为，日本对阳明学的理解主要是把它与朱子学对立起来，强调它是“内心精神上的自立”、“打破既有规范秩序的跃动着良知”的学问；这种认识把阳明学定义为确立内心主体性的学问。如果再考虑到日本的“自然”外在于人这一认识论特征，那么可以理解，这种“内心主体性”虽然可以无限地活用心的功能，却正如沟口指出的那样，它最终没有形成真实的社会运动，而是止步于个人与天在精神上的合一。在《李卓吾：一个正统的异端》中，沟口对于日本的阳明学有这样的分析：日本把“心即天”的心理解为不掺杂任何意念、私欲的澄明的心，“天”换言之就是真实无妄的诚。而根据这样一种对“心”的理解，“心即理”就是以“诚”——心的至上状态为“理”，换言之，就是把除却了一切邪念、造作、私欲的无限澄明的心状态看做“理”即至高的状态。在《两种阳明学》中，他通过对大盐中斋的分析指出：“中斋之所以为无善无恶说所吸引是因为他将‘无’解读为完全纯粹无妄，亦即虚灵，而虚灵正是他的‘心

即天’的思想。”正是通过这种日本化解读，使得阳明学在日本被抽象为一般性的内心精神的内发性、能动性、主动性等等特征，并将这种一般特性视为阳明学的本质。于是，按照日本的理解，阳明学的功能在于个体独自性地建立与天的合一关系，这种合一也就是“诚”的状态。这种诚的状态，特征在于是个体精神趋向与天的合一，是以精神的纯粹性为前提的，它不具备人与人之间横向的融合与贯通，因此也不可能形成现实的社会运动。沟口认为这种理解扭曲了中国的阳明学，因为经过这样的抽象之后，阳明学失掉了它的灵魂。为了强调中国与日本两种阳明学的这一根本差别，沟口甚至断言，日本没有阳明学，它应该使用另一个名称，因为世间根本就不存在两种阳明学。

沟口认为：阳明学的真意在于呼应明代中叶的时代课题。随着里甲制在这个时期的动摇，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划时代的转折，乡绅地主阶级的兴起对于原有的君·官对民的统治形式提出了挑战，专制皇权需要通过乡村中的乡绅阶层才能进入基层社会，而以皇权和地主阶级权力的矛盾为首的各种力学关系引发的矛盾也在这个时期表面化了。“心即理”的命题，正是通过主体之心来担负起寻求应对历史现实的现实之理的责任，在这一意义上是主动与能动的，但这种主动性与能动性是为了探索和确立具有现实功能之“理”的，绝非一般性的泛泛而论。换言之，不可以对于阳明学进行无“理”的理解。与日本的阳明学对于“诚”的强调相对，中国的阳明学更注重的则是形而下之“理”，而理所具有的现

实指向性，正是所谓“儒教的大众化”。

关于阳明学何以对抗朱子学，沟口给出了社会史的解释：朱子强调宇宙万物都是法则性的存在，这个朱子学的核心思想在明代中叶已经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因此朱子学为证明法则性而花费诸多手段（居敬、穷理）的方法论，在阳明看来只不过是浪费时间；同时，朱子学的格物穷理，针对的是上层社会的君臣，试图通过君臣合乎条理的修养影响政治，并完成自上而下教化民众的事业；到了阳明的时代，这种自上而下的乐观主义已经暴露了它脱离现实的弊端，且由于体制化而成为思想的桎梏；阳明对抗的，与其说是朱子定理的内涵，毋宁说是这种贯彻理的自上而下的方式；从他起草的《南赣乡约》与朱子的《劝谕榜》和明太祖的《六谕》在内容上高度重合这一事实看，他所追求的秩序观念和教化内容与后者并无二致。不过阳明的“心即理”，是从大众的角度自下而上地推进这个进程，因此“满街皆是圣人”就把承担新的道德意识形态的主体从上层的统治者那里转移至市井和乡村中的中坚阶层，即绅的阶层。正是由于这一主体的转移，也致使阳明学在内涵上相对于朱子学的“定”而显示出多样与流动性。尽管“心即理”（致良知、事上磨炼、知行合一）、“万物一体之仁”打开了朱子学向下层社会封闭的大门，同时也使得阳明学的“心”担负起比朱子学的“格物”更为艰难的解决现实课题的责任，但是沟口认为，阳明学并未创造出新的秩序观念，在意识形态上，阳明学在面对新的时代思潮时推进和转化了朱子学提出的基本课题，即如何使

天理转变为人间政治的核心；它打破了朱子学在朱子身后所累积起来的僵化教条的体制化枷锁，在事实上是以激烈的批判态度完成了对于朱子学精髓的传承。

沟口有关阳明学的研究数量并不多，却有着很重的含量。当朱子学被视为教条、僵化的封建意识形态，阳明学被视为反抗外在权威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学说时，这种对立由于依赖了静态的视角，便微妙地偏离了思想史的轨迹。值得注意的是，当沟口把日本的阳明学引入讨论视野的时候，我们获得一个参照，得以发现中国的阳明学与日本的阳明学不同质，却与中国的朱子学具有不可视的同一性。日本的阳明学由于强调的是个人朝向天的同一，不具备“满街皆是圣人”这种横向连接的功能，故无法成为具有社会运动形态的思想；而中国的阳明学所具有的这种横向连带的社会特征，既与明代中叶的历史要求直接相关，也与中国思想史的基本母题无法分离。

在《两种阳明学》中，沟口指出：“‘天即理’先天地普遍内在于每个人之中。人与人作为先天的天和理的普遍的共有者横向地相互连为一体，因此，天人合一同时也是人人环而为一，天是每一个人横向相连的通道，如果说这是‘贯穿’的话，天横向贯穿于每一个人，而贯穿的条理也就是理之条理。”

可以说，从“天即理”到“心即理”，中国的儒学在历史脉络中完成了一个有序的转变，把外在于人间世界的终极性道德标准转换为内在于人的现实秩序准则，把由统治阶

级独揽的意识形态特权转换为下层精英主体性承担的政治理念。在这样一个转换过程中，天人分离并未发生，也不可能发生，新的天人合一所提出的，正是一个中国式的政治治理课题：在这个竞争激烈矛盾丛生的广袤土地上，什么样的治理模式才是行之有效的？历代思想家思考的看似玄虚的命题，正是以这个极为现实的课题意识为前提的。而思想家们之间在观念上的激烈对抗，由于同样发生在这个天人合一的政治框架之内，历史并未因为种种思想交锋而断裂，对此，所谓近代意义上的个人价值之类的观念很难成为基本的评价标准，则是不言而喻的。

在从天即理向心即理的这个转换的延长线上，有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即明末李卓吾的思想。本书把沟口的李卓吾评传和他的阳明学研究放在一起，尊重的正是这个内在的脉络。

沟口在李卓吾那里发现了中国的“道”。这是一种接近于信仰的信念，它鼓舞着李卓吾终生进行不懈追求。而这种追求的精神，也正是把李卓吾和吉田松阴连接起来的契机。

李卓吾与松阴，在毕生追求“绝假纯真”的姿态上，具有着惊人的类似性；甚至下狱的经验和耿直的性格，也有着共通性；不过，关于真的理解，他们却并不相同。这一点在他们关于“童心”的论述上就有所呈现：“松阴所说的童心的‘真’，是未受到后天污染的先天的清纯之心，更准确地说是正义之心，因此必须是恶恶善善之心。”（沟口雄三，

《李卓吾：一个正统的异端》）而李卓吾的童心虽然也是相对于假而言的真，却是以人与生俱来的欲望为前提的，对于李卓吾而言，就连善善恶恶之心也难免被视为后天之“假”，即所谓“道统”观念的表现。他所主张的赤裸裸的欲望，绝非“清纯”可以形容，它是一种拒绝现有道统观念的意识形态，是以这种拒绝为前提的对于“人欲”的张扬（关于李卓吾并非主张无节制的纵欲这个问题，《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一书有细致的甄别，在此不赘述）。如果说李卓吾与吉田松阴有什么一致之处的话，正如沟口指出的，这种一致之处在于：“松阴和李卓吾都一贯否定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既存秩序关系，在否定的坚决程度上两者是有共通之处的。”（《李卓吾：一个正统的异端》）

正是对于欲望所表现的这种思想立场，使李卓吾在明末以最为激烈的方式推进了阳明学“心即理”与“无善无恶”的思想课题，把它转化为“形而下之理”，并且通过“真空”这一理论契机使其与穿衣吃饭、与人的物质欲和占有欲发生了真实的关系。虽然在政治观念上，李卓吾与谋求地主阶层权力的东林派人士的立场并不一致，他试图维护和强化的是自上而下的王朝统治秩序，但是在历史脉动的大方向上，李卓吾对于既定社会秩序的否定和他不断求道的姿态，却具有着思想先觉者的意义。按照沟口的分析，朱子学由于把道德本性视为人的本质，在原理上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但是在论述上却把这种道德本性的实现（亦即成为圣人）限制在了统治集团内部；阳明学继承了把道德本性视为人的本质

这一前提，但是却扩展了它可以实现的范围，把更广泛的阶层纳入其中；而李卓吾则否定了这个前提，不再把是否成为圣人作为人的终极价值，而是把欲望提到了人的本质的高度。他认为，生存的欲望才是人的本质。对于生存欲望的肯定，也就是对于“人人”的个别多样性存在的肯定，因为欲望因人而异，所以李卓吾认为需要追求和确立“千变万化活泼泼之理”；道德规范因此不能不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具有现实性的原理。李卓吾的“童心说”和“绝假纯真”，由此与阳明学的母题密不可分，这也是理解“中国原理”的重要线索。沟口花费大量篇幅论证“两种阳明学”的区别，在社会史的视野里提供了重新思考“人欲”的思想契机，是非常值得玩味的。值得关注的是，即使在李卓吾如此激进的童心说和无善无恶论中，也没有发育出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观念来，相反，“万物一体之仁”所体现的中国式共和思想，并没有给个人的神圣权利预留充分的发育空间，但是也并不意味着抹煞欲望的个别多样性。这个微妙的分寸感对于理解中国的历史逻辑和今天的社会现实，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认识论价值。它意味着不能把西方的个人权利形而上地绝对化，不能望文生义地把中国思想史中对于个人欲望的强调附会为对于个人权利的强调；在西方以个人权利和契约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社会遭遇到种种困境的时候，重新思考和把握中国思想中“千变万化活泼泼之理”，也并不意味着传统社会已经预留了取代西方的现成思想方案；中国思想的原理，因为它特有的形而下之理的特征，需要我们调整自己的视角与分析

工具才能够发现和建构，而无论是模仿西方还是否定西方，都无法有效地完成这个工作。沟口思想史研究的原创性，就在于它并不介意与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对应关系，从而才得以有效地捕捉到了这个形而下之理的灵魂，并在形而下的层面坚守住了这个千变万化之理。这种理论性与经验性的合一，开启了一个新的窗口，让我们得以用新的目光重新审视中国原理跃动着的生命，虽然为了对其进行有效的表述与传承，还有着艰苦而未知的跋涉之途，但是毕竟，沟口作为开路人中的一位，已经让我们遥望到了未来的前景。

目 录

代译序 追寻形而下之理 孙歌 1

李卓吾：一个正统的异端 孙军悦译 1

前 言 3

壹 吉田松阴与李卓吾 11

1 偶 遇 13

2 真与假 25

3 狂悖和愚蠢 39

4 知己难求（一）：胜己之友 53

5 知己难求（二）：知己之主 69

6 死之一字（一）：“情人”的“甘死” 83

7 死之一字（二）：一种回心 95

贰 李卓吾：其人与思想 111

1 七十六岁的生涯（一）：一犬之五十年 113

2 七十六年的生涯（二）：遭受迫害的七十岁 127

3 “无”与“真空” 150

4 两种阳明学 168